

*Wang Gou*  
朱子家著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五冊

春秋雜誌社印行

汪政權

場收與場開的權政汪

(冊五第)

著家子朱

行印社誌雜秋春港香

## 旁 白

我幾乎以一個人的力量，來寫汪政權的這一幕往史，本意以四冊告一結束，這第五冊的刊行，可說完全出於我自己的原定計劃之外。

爲甚麼再要有這一冊類乎蛇足的補篇呢？我有着太多的感想：

首先，我想對自己的寫作有所聲明。當我一開始撰述本書時，開宗明義就會坦白地說過：「現在純憑記憶來追寫，相信一定會發生很多的錯誤」。果然，就有人出了專書，批評我爲「向壁虛構」，爲「公然說謊」。我檢討了我所寫的前文，十九被指爲虛構爲說謊的，我卻都有所本。惟英國對滇緬公路的封鎖，確是已在汪氏離渝之後，我不得不承認這一點記憶上的錯誤。但我並不是在蓄意造謠，假如我要以此來爲汪先生辯解的話，對如此一件大事，我又何至留下這樣一個漏洞，以供別人的吹求？但是，雖然沒有被別人指出，而我自己卻發現了不無有些無心之失，這第五冊的刊行，就是爲了要自動更正前書中若干的疵謬。

其次，最初我自己不敢對此書有能够完篇的信心。在以煮字療飢的處境下，文債山積，不暇週諮博訪，故每出於倉卒成章。更加以我當年微不足道地位，十分狹陋的見聞，而又以「知之爲知之」的態度，大體上所寫出的僅限於我個人親見親聞的一角。若干重要情節的遺漏，自屬難免，我也以此引爲莫大的遺憾。在這年餘中，我不斷訪問了現猶羈旅在香港而又確信其當年曾對某一件事會身親的舊侶，以窮其隱微曲折。無如朋好凋零，半已作古，卽或猶健在人間的，亦以幾經世變，百感繁懷，對此陳述，形同隔世。更有以「往事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的心情，不願再有所贅述。這一冊的續印，原是爲了補漏，而一鱗片爪，仍然遠難滿足我所祈求的願望。

戰後十餘年，在我之前，國人中似還不會有人寫過對這一幕往史較爲完整的記述。不意拙著一經問世，拋磚引玉，竟爾風起雲湧，似以寫汪政權爲一時的風尚。就我所能見到的，已不一而足，對我有批評的，更實繁有徒。當我一誠心誠意地拜讀之後，我有些驚訝，也有些慨嘆。在我所見到的許多鉅著之中，有些人並不在想供給史料，也並且不能供給史料。他們都對汪政權是全無關係的人，有些當年又並不會處身在淪陷的地區，現在也不想發掘真實的資料。他們只是撫拾一些不經之談，加上自己神奇的構想，以大造其空中的樓閣。而他們卻有着一個共通的原則，是先挾了一個成見，立意要把這

一幕時代的悲劇，盡量醜化，盡量歪曲。好像不罵汪政府，就不足以顯出作者的忠貞；不多指出幾個「漢奸」，也就不足以顯得中華民族史上的「光榮」！

有些人寫的不僅是小說，而且簡直是神話，異於我所聞，異於我所見，自不足為怪。但竟有與我同姓同名的人，在書中出現。若說是我，那末他所描繪的情節，連我夢也不會做過；若說不是我，何以對這同名同姓的人，我竟會無緣識「荆」！

也有人想以栽贓的手法，指主和者即為漢奸，而主和的也僅為汪氏。不料他所剽竊得來的資料，處處顯得當年主和者卻另有其人，弄巧成拙，我只有憐惜他處境的艱難。更有人指我前四本書中所寫，可信者不足一百字，其人且自命為「史家」，而居然一筆抹煞，乃有此像是苛論的妙論，我鄙薄他這無知的武斷。至於有人說：凡是參加過汪政權的人，都在可殺之列，我又代扼腕於他們的未能得居高位，得以誅盡異己！

真是够熱鬧的！引來了各式各樣的「珠玉」，實非我始料之所及也！

我一直留心着有關這一幕的記載，有些他山之石，確足用為攻錯。在日本出版的書籍，與報刊上有些國人的著作中，也常常發現我所不克知與不獲知而認為可信的資料，不辭抄襲，標明出處，盡力搜羅，雜之本冊，以補我書之不足。

這一段近史，我前後雖已寫了六十萬言，定知遺缺者尚多，而錯誤也定不在少，自

已於校閱中，感到因初稿於匆忙中陸續寫成，太多辭意重複，層次凌亂之處，更安得以餘年重加整理呢？甚願讀者諸君的不吝指正，所有一切善意的批評，我自將樂於承教。

公元一九六四年元旦

著者金雄白寫於香港旅次

## 目次

- (一八一) 沒有打早就有人談和了……………(一)
- (一八二) 高宗武坦承奉蔣命謀和……………(七)
- (一八三) 秘密談和者有些什麼人……………(一一)
- (一八四) 從一面抵抗到一面交涉……………(一八)
- (一八五) 充滿着惶恐戒懼的重慶……………(二三)
- (一八六) 離渝計劃先得龍雲默契……………(二九)
- (一八七) 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三八)
- (一八八) 曾仲鳴在河內醫院不治……………(四五)
- (一八九) 汪氏親撰舉一個例全文……………(五三)
- (一九〇) 汪爲曾仲鳴之死激動了……………(六三)
- (一九一) 汪與方曾兩家淵源深厚……………(六八)

- (一九二) 方君瑛仰毒自戕的眞因……………(七四)
- (一九三) 日政府遣影佐助汪離越……………(八〇)
- (一九四) 由越赴滬一段艱險航程……………(八六)
- (一九五) 周佛海路線終於登場了……………(九二)
- (一九六) 司徒雷登任寧滬間橋樑……………(九七)
- (一九七) 汪氏赴日談判組府條件……………(一〇四)
- (一九八) 高宗武爲甚麼出之一走……………(一〇八)
- (一九九) 陶希聖怎樣爲自己表白……………(一一五)
- (二〇〇) 舊創誘致多發性骨腫症……………(一二〇)
- (二〇一) 在名古屋病院中的汪氏……………(一二四)
- (二〇二) 汪墓原來是這樣被燬的……………(一二九)
- (二〇三) 黯然無語中開結束會議……………(一三三)
- (二〇四) 又見那一片降幡出石頭……………(一三八)

## 附 錄

- (一) 汪政權重要人事表……………(一四四)
- (二) 陳璧君獄中詩詞殘稿……………(一五二)
- (三) 汪精衛逝世前對國事遺書——「最後之心情」……………(一五四)

## (一八一) 沒有打早就有人談和了

汪政權經千迴百轉而終於創建，衆口鑠金，一般人都深信當時的政府要人中，惟汪精衛與何應欽爲始終主和的人物。因有此先入的成見，更以與日本穿針引線者爲高宗武，汪氏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時，高爲外交部的亞洲司司長，自更易附會於高之與日方暗通款曲，必係出於汪氏之授意。究諸事實，其然，又豈其然耶？

假如真是衆「醒」獨「醉」，主和者確惟汪氏一人的話，則南京猶未陷落，而卽有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之出任調停。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在漢口舉行之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議，一聞蔣氏有接納條件之意，袞袞諸公，隨聲附和，何以全場竟無一人表示反對？如主和卽爲賣國，則滿朝且盡成醉漢。固然有以「大砲」聞名，且不久前以言行無狀，會被台灣當局管訓多年之龔某其人，寫了一本「汪兆銘降敵賣國密史」，罵汪罵周，兼又罵我，而所依據的卻又並不是他耳聞目擊的資料，僅剽竊了日本人出版的三本書中的記載。他認日人所說的爲絕對可信，而指我所寫的則爲向壁虛構，這一份奉日人的言論爲金科玉律的態度，煞是可驚！我寫了五六十萬言，而他在標題上卻大書「金雄白向壁虛構者」有三，五六十萬字中如其所稱虛構者僅有三點，那他不是在罵我，實在是捧我了。而這三點中記佛海之家世及清黨時在滬被捕經過，我則錄自其生前所著「往已集」中之「苦學記

「及『盛衰閱盡話滄桑』兩文（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中有收藏），實有所本，我並不是向壁。至於上述的最高國防會議記錄，他說是我寫書時捏造的，他眼中只有日本人，連汪氏在河內親自起草曾經在港滙報紙發表的「舉一個例」也不知道，還治些什麼史？那末，政府方面偷偷地想與日本談和，究竟是誰發動？如何談法？這千絲萬縷的經過，前書未盡其詳，有先加以補充的必要了。

在抗戰開始之前，中央的決策是十分明顯的，廬山會議的文告，曾有傳誦的警句，說得最爲明白，即「和平非至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是也。那時日人雖步步進逼，而當局鑒於國力未充，「安內攘外」是當時一再堅持的國策，文告中還把抗戰說成是一種犧牲，而不是「必屬於我」的勝利。這抗戰史上最重要的文獻，到今天仍深印於國人的腦中，是誰主和？自決非一二人可以憑宣傳手法來抹煞事實，改寫歷史的。

正因爲當局內心之決不輕言犧牲，故當中日兩國關係處於極度緊張之際，就有人出而暗中奔走和平。那時與日本談和的既不是文的汪精衛，也不是武的何應欽，而是蔣氏的最高智囊黃郛的日本同學吳震修。吳震修那時是中國銀行的南京分行經理。當時，我與他尙未相識，以後淪陷區的中國與交通兩行由汪政權命令復業了，改制以董事長爲實際的負責人，交通銀行由原任該行的總經理曹壽民出任董事長，中國銀行周佛海本屬意於周作民，他因有不能出任的苦衷，而改推北京時代中國銀行的總裁馮耿光，馮又堅辭，只肯擔任董事名義，於是卒由吳震修承乏。這位人稱吳二爺的留日前輩，因爲我以後也備位於中國銀行的董事之列，與他有過兩年的同事關係。我個人對他的印象：是機智、沉着而

又明識大體，確是一個難得的人才。他不但與黃郛有着同學的關係，與宋子文更有着密切的淵源，他的終於出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也許並不是真正與汪政權合作，而是爲了保護中國銀行在淪陷區的資產，爲宋子文看家而已。所以勝利以後，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的檢察處，居然不查背景，冒昧行事，首席檢察官杜保祺以爲他祇是有錢的銀行家吧，對他發了傳票，要以「漢奸罪」偵查起訴。他於接到傳票後向法警說：「傳我，我是不去的，一定要我到庭就鞠，那末就來拘我罷。」那時宋子文方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他有時飛穗去作貴賓，回滬以後，仍安居原處，法院也就法外施仁，秋毫無犯，這是所謂「肅奸」案中唯一不敢肅的特例。我所以不嫌求詳地敘述我所知於他的事實，因爲他是奔走中日和平的第一人，也是與當局極有關係的一個人。

早在抗戰發生的前兩年，日人西義顯奉南滿鐵路總裁松岡洋右之命（按松岡最後出任日本外相，美日談判之破裂，日軍南進政策之促成，均負有極大之責任。故勝利後盟軍遠東軍事法庭將其列入甲級戰犯二十八名之內，在審判中病死東京巢鴨監獄），擔任南京辦事處主任。那時東北早已淪陷，南滿鐵路在南京有什麼設立辦事處之必要？而且政府又何以竟然准其設立？足見西義顯的銜命南來，也必附帶有更重要的使命。

可以相信吳震修倒決非是一個親日媚敵的人，爲人淡泊自甘，一生絕不奔競於名利，但以與當局爲近水樓台之故，必然明白此時的國力還不能與日本作戰；而此時最高當局的意志，也尙還不願與日本立時破裂。他與西義顯爲同住在南京江蘇路的近鄰，因之過往極密，對於挽救中日間當前危險的局

勢，在半公半私下就不時作深切的密談。微風起於蘋末，誰也不會料到這兩人像是私人間的行動，以後會演變而拉扯到當時毫無關係的汪精衛身上，最後竟至挺身號召和平，終且出現了汪政權的一幕。

真正的發動和談，則是在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時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高宗武，一向以日本通自命，出入於CC及汪派之間，爲一時最露鋒銜的人物。他與吳震修的相識，也許由於當時外次唐有壬的介紹。吳高均認爲局勢已到了最嚴重的階段，如一旦演變而成爲全面戰爭，中日有同歸於盡之勢。經高宗武與吳震修不斷交換意見之後，決定由高向當局建議，由他擔負起說服日首相近衛的任務，早日恢復和平，以避免戰事的擴大。高宗武的自效，竟獲得最高當局的默許，乃即着手進行既定的步驟，即由吳高邀請西義顯在吳宅會面，促其過返大連，通過松岡洋右而向近衛進言。西義顯返抵大連，並將南京實際情況詳爲分析之後，松岡終爲西義顯所說動，既濟以鉅款爲此後的活動費用，且又寫了一封懇切的介紹信着其回日面向近衛陳說。不幸當西義顯返抵東京，上海的戰事也已爆發，局勢一發而不可收拾，軍人又氣餒方張，連近衛也乏旋轉乾坤之力了。

當「八一三」淞滬發動全面抗戰後不久，英國駐日大使，與德國駐華大使，都曾先後出任調停，英國方面的調停，曾由駐華大使與蔣氏夫婦當面談判，在原則上蔣氏表示可以接受，問題僅在日外相廣田所提出的條件中的非武裝區問題，此事卒以日本軍人的反對而終止。其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中國雖表示接受，而又以就誤了日方的最後限期，再歸泡影。

局勢演變至此，秘密談和似可告一段落了，而高宗武以受當局付托之重，仍不甘於半途而廢。一

九三八年的一月，政府已西遷漢口。而奇峯突起，西義顯方寄寓於上海南京路口外灘的惠中飯店，外交部亞洲司的第一科科長董道寧，突然去叩門訪問，此舉使西義顯大吃一驚。他認爲以一個政府的外交官員，而潛身至淪陷地區與敵國人員接觸，當必有所爲。他立刻想到這時正在德國陶德曼大使的調停期間，很可能就是爲了想使日本所提出的條件能有所讓步。一經見面，董道寧也坦率承認了係奉高宗武之命確是爲此而來。西義顯是對和談有興趣的人，就慫恿他親自赴東京一行，俾與日政府當局直接磋商。董道寧也欣然同意，經過一切必要準備後，於同月的十四日抵達日本。而兩日以後，日政府因漢口延誤了德使調停的限期，宣佈了「不以蔣介石政權爲交涉對手」的聲明。高宗武方衝命在秘密進行和談，而日本竟出之以不與蔣氏談判的聲明，雖原因不在高宗武本身，但在工作上則無疑證明了高宗武的澈底失敗。其後高改而拉攏陶希聖、梅思平相與沆瀣一氣，轉向汪氏勸誘，除了無法證明的別有其他政治上的謀略而外，至少因他無法向蔣氏交待，乃爲個人的功利而另謀出路，這是一個最關重大的轉捩點。

這裏可以附帶談一談董道寧這個人，我看到他已經很晚了，已在我參加和運之後，且已搬入愚園路一一三六弄六十號與羅君強同住在一起。他那時已隨同汪氏去過日本回來，而且不再做什麼外交部的科長，表面上係在上海的金城銀行做事。他幾乎每天必到我們那裏來，分別與汪周談話。他操着一口甯波的土話，胖胖的身裁，饒有商人的氣息，決不像是一個搞政治或外交的人物。自高宗武對汪氏叛離以後，他的踪跡，也就此在愚園路上消失了。

董道寧的赴日，也並不是全無收穫，他由西義顯的介紹，得以晤見時任參謀本部專辦對華問題的第八課課長影佐禎昭，董對之大談其中日全面和平問題。以董道寧當時的地位而論，自不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但以敵國的外交官吏，而秘密間關赴日，實予日方以極佳的展望。故當董道寧由日於三月初啓程赴大連，再經港折回當時政府所在地之漢口時，影佐即寫了一封親筆信托其帶交張羣與何應欽兩氏。函中備述董道寧來日所傳達中國謀和之誠意，更望繼起有人云云。影佐的致函張何，當然其目的在蔣，故董道寧回抵漢口，即以之交於蔣氏侍從室的周佛海，而由周直接呈交於蔣氏。蔣氏當時對此如何表示，當年我雖與佛海朝夕相見，深悔未及一詢其究竟。但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高宗武公然敢遣其部屬，於戰爭當時赴敵國通謀，如未奉有命令，自不至膽大妄爲，一至於此。但假如這是出於汪氏的授意，則影佐之函即應逕致汪氏，又何至托董道寧呈給毫不相干的蔣氏之腹心？所以不論在抗戰以前，及至南京淪陷的一段時間爲止，所有吳震修、高宗武、董道寧的活動謀和，均與汪氏無絲毫關係。英德兩大使之調停，亦均直接與蔣氏談商。當時政府的態度，也僅有條件上的磋商，絕未對原則上有所拒絕。是則主和謀和者，不論爲下令者或奉行者，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又豈能一律目之爲通敵叛國乎？

## (一八二) 高宗武坦承奉蔣命謀和

因爲董道寧的赴滬轉日，又折往大連，稽延了過久的時日，使奉命辦理對日談和的高宗武，有了迫不及待之情。他於一九三八年春，由漢口啓程取道香港直達上海，又與戰時日本官方通信社同盟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密談和平條件。松本不僅爲日本首相近衛的私人駐華代表，亦且與孔祥熙之間有聯絡。不久高宗武又回香港，而松本即將高宗武的接洽情形轉呈給近衛後，在三月二十七日那一天，高宗武、董道寧、西義顯、松本重治與伊藤芳男五人，相約在香港淺水灣酒店進一步談商和平問題。所談論的已經從和平的原則談到了條件的細則。五人會商後，日方即派伊藤攜帶高宗武送來之意見，直赴東京，高宗武與董道寧則又回漢口向當局報告。至四月十六日，高董又回到了香港，高約西義顯單獨見面，他鄭重聲明：「係奉蔣委員長之命，向日方傳達中國方面的意見。並謂影佐致張羣、何應欽的密函，經蔣委員長閱讀後，對影佐表示欽敬與感激。對於中日的和平條件，蔣委員長認爲：東北與內蒙問題，可留待他日再談，惟河北省應即交還中國，長城以南中國的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日方應予尊重。上項條件，如獲日方之諒解，則先行停戰，再行談商細則，請西義顯立即轉告影佐。」

西義顯於四月二十七日返抵東京，在參謀本部次長室將蔣氏之和平條件提出。此時徐州會戰，正達決定階段，戰事的勝利，更增加了日人的狂妄，恰好又不是談和的有利時機。日首相近衛且在地方

長官會議席上，公開有澈底膺懲蔣政權使之潰滅的強硬表示，卒使高宗武又遭到了第二次的失敗。所應引爲惋惜的，這謀取和平的動議卻都出之於我方的政府官員，而換來的只是日方蠻橫無禮的峻拒，而且近衛內閣竟兩次表示了不與蔣氏妥協的決意，遂使奉命談和的高宗武陷於最狼狽的境地。

高宗武似乎是對中日和平特別感到興趣的一個人，他雖被日方的一再拒絕，卻並不會使他灰心，如此鍥而不捨，是爲了他個人的功利或者竟是出於政治的因素，我不敢武斷。不過他這時正奉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在香港太子行以宗記洋行名義表面辦理商務，實際則代蔣氏負擔對日聯絡與覓取情報的工作。經與日方一再接觸，深知要日方直接與蔣氏談判，已經絕望，於是眼光就轉注到地位權力僅次於蔣氏的汪氏身上。他先與汪氏有深切淵源的李聖五在港商量合作，他自稱代表蔣氏，而請聖五代表汪氏，既爲聖五所謝絕，於是乃轉商於他的溫州同鄉梅思平。思平此時正在港擔任蔚藍書店的編輯，渡着清苦的生活，靜極思動，因此而一拍即合。

一九二八年的七月五日，高宗武忽由港乘日本皇后號船抵達神戶，與日方再謀接觸。即由影佐引見板垣陸相與近衛首相，高竟提請以汪氏爲交涉和平的對象，並要求近衛寫一親筆信給汪氏，申述日本之誠意，希望汪能出面主持和運，最後此函是由板垣代寫。高宗武這一着是高明的，他要挾日方負責當局的書函爲證，用以說服汪氏。但也可證這次高宗武的赴日，仍非出於汪氏的授意。即龔某雖大罵汪氏，而在他書中引述張羣對他的談話，也一再說：「汪在開會時從未發表反對戰爭主張和平的言論，且舉出一重要證明說：『二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已經失陷，蔣委員長由南京經廬山到漢口，